

善养生者,先除欲念。——《男女绅言》

□ 记者 鲁龙飞 文/图

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,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深入,大批农村人口纷纷涌入城市,这批大多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就是第一代农民工。

30多年来,他们在工业化、城镇化、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,如今,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们逐渐退出城市舞台,淡出公众视野。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游走了数十年后,不管他们愿不愿意,岁月都将他们无情地推向了返乡之路。

日前,市场星报、安徽财经网记者走访了合肥各大工地上的这些建筑工人,并实地探访有中国“吉普赛人”之称的庐江罗河镇,零距离接触返乡的第一代农民工生活现状。



农民工李生枝



农民工贡家柱

待我返乡,怎么养老? 第一代农民工归宿调查,50多岁的他们: 归乡回家,有诱惑更有困惑

“超龄”的坚守

日前,记者在合肥各大建筑工地随机走访的4名50岁以上农民工中,他们无一例外均因“经济压力大”才选择外出打工,他们或子女正在上大学,或打工是家庭的唯一收入,或子女虽然成婚日子过得也紧巴。

经济不富裕是坚守的唯一动因

为何快60岁了,还要外出打工?

“不打工,哪来的钱供儿子在城市里买房子?”出生于1963年的李生枝,合肥市长丰岗集人。16岁的时候,他辍学后便开始当瓦工,之后外出打工,一直到干到现在。

7月20日,记者在合肥市滨湖一建筑工地见到李生枝的时候,他刚从工地打完混凝土回来。脚上穿着胶鞋还沾满了水泥浆。或许是整天被太阳暴晒,后脑脖子上已经被晒成黑黢黢的一片。

当记者说想采访他的来意后,生性憨厚的李生枝微微笑了一下,“我们都是普通人,有啥子好采访的”。交谈中,李生枝告诉记者,他是1983年开始外出打工的,第一站是深圳,在一建筑工地做普工,当时工资300元/月。

“2010年,工资涨到了100元/天,包吃住,有时一个月40个工(算上加班),月赚4000元;前两年又涨到了200元/天,银行户头里的积蓄,一半是近几年存下来的。”李生枝笑着说。

现如今,已经在建筑工地摸爬滚打30多年的李生枝最大的愿望,就是想给大专毕

业的儿子买套房子,从而在城市扎下根。

与李生枝有类似情况的还有来自凤阳的贡家柱,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他,坚守建筑公司的一个重要因素是,害怕回乡后收入下滑,杯水车薪的新农保不能维持他和妻子的基本生活。

20多年来,打工所得占贡家柱收入比重维持在80%左右,若停止打工的脚步,就只剩下960元/年新农保,1200元/年独生子女抚养费,外加8000元/年土地收益,合计在一起不足1万元,维持他和妻子两人的生活怕不够。

“也想过要放弃打工生活,回到家乡过几天安稳的日子,可想想要是不做,未来养老的负担就落到唯一的儿子身上。”谈起儿子,贡家柱有点自豪,娃子,名牌大学毕业留在昆山,买了套房子家里出了首付,按揭都是他自己还,压力不小。“趁着现在身体还健朗,做一天是一天吧。”

交谈中,不少人都有同贡家柱一样的担忧,“年轻的时候,单位也没给交啥子养老保险,如今,年龄大了一切都迟了,还是自己多辛苦点吧。”

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病是常态

建筑工地的活,在普通人眼中就是脏、乱、苦,夏天骄阳暴晒,冬天寒风刺骨,久而久之,恶劣的生活环境也慢慢侵蚀了这些第一代农民工们的身体,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病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。

与贡家柱同乡的王根洋,今年已经65岁了,体力已经不比壮年时期了。幸亏包工头是家门口的,乡里乡亲的不好开口不要他,否则外出打工都没人要了。

建筑工地加班是家常便饭,尤其是打

混凝土的时候,经常是白天上了一天班,晚上还要接着干,这个时候,王根洋明显感觉体力不足。年前,腰肌劳损住了一个月的医院,现在只要干重活,第二天便下不了床。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风湿性关节炎等职业病也出现在其他人身上,老家在蒙城的农民工马万山表示,“晚上收工或阴雨天天的时候,胳膊经常出现酸楚,有时候连一瓶水也提不动,犯病的时候,洗衣服基本靠脚。”

归乡的困惑

打工,要能抡得起大锤,扛得住钢筋,但当挺直的腰板变得佝偻,当矫健的步伐开始滞重,衰老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。因此,返乡,是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的无奈选择。

坐落于庐江县南边边陲小镇罗河镇,上个世纪90年代初,得益于国家电网迅猛发展,几乎是整个村的男性劳动力都外出打工,挣回来了钱,养活了全家,如今已经年近花甲的他们,回归故土的生活如何呢?

归乡继续操心劳累

今年58岁的鲁少国是庐江人罗河镇双桥村人,算得上是当地第一代农民工,上个世纪90年代初,他开始外出打工,辗转苏州、湖州、恩施、广州等地开拖拉机、扛钢筋、爬铁塔,这一干就是20多年。

常年在外漂泊的生活让他有了倦意,于是身心疲惫、力不从心的他最终选择了回家。由于老家附近是矿区,田地被征用了,这让鲁少国无法重新拾掇起农活。

本想颐养晚年,可是随着生活成本的增长,再加上两个孙女上高中,一个孙子上初中,一年下来免不了要花销。“儿子儿媳,都外出打工了,老太婆在家照顾几个孙子女,我闲着也无事,在村办工厂打点小工,贴补下家用。”

类似的情况在这个村庄比较普遍,68岁的鲁金现在在外打工回家后,在合肥工作的儿子原本想去合肥一起生活,可是他不想去,“城里人生地不熟的不自在,再说孩子也不容易,不能给他添麻烦。”

好在附近就是矿区,工人比较多,破铜烂铁、空矿泉水瓶等废品比较多,隔三差五去收集下,一天下来也能挣个五六十元,这些钱大部分都被用于抽烟和喝点小酒,“苦闷的时候,工友们都以抽烟和喝酒度日,坏习惯养成后就戒不了,如今老了,也不想戒了。”

重操农活已经不适应

陈龙,罗河大包庄人,年轻的时候与同村的人一起去做电力工程,如今年老后,他又回到老家。由于一直在外打工,家里的田地早些年还有人耕种,后来打工盛行后,村庄里只剩下“老弱病残”,田地也就荒芜了。

“远处山上的田地已经荒芜多年,现如今都长满野草和灌木了;近处的田地,也不用养牛来翻耕了,因为有机器替代,有人出租机器和负责操作,主人反而成了帮手。”陈龙清晰记得,刚开始操持农活时,明显感觉不适应,过了好久才缓过来。

与重新拾掇农活相比,更让陈龙不能接受的是,现如今农村人与人之间很少往来,哪怕是邻居,平日里见面也不多。大家经常是把自己关在家里看电视,或者每天骑摩托到镇上转一圈。镇上商店外摆着多张椅子,那里成为人们交流最多的“公共场所”。

“小时候,村里还有露天电影、庙会、台球室、舞龙灯……然而,现如今这些文化活动都已经消失殆尽了。”与陈龙同岁的张先录称,乡村太安静了,虽然站在熟悉的土地上,但他感觉好像缺了什么,原本想过着含饴弄孙的生活,但总觉得生活在一种没有希望的境地……